

资阳史话

王洪林著

已
古
社



资阳文献丛书总序

天健龙德洋岳莲美圣类张新

爱国精神，桑梓情怀。烈士陵园，卫国营桑。
文物保藏，开发深埋。博物馆兴，巨细兼赅。
女头化石，四万年推。蜀人始祖，象齿依偎。
天然规律，地质安排。五台浅邱，内海梯阶。
天府海岸，莫须惊猜。陵谷变迁，水陆萦回。
文明进化，造福避灾。新思络绎，换骨脱胎。
挺风骨之峥嵘，征特色于崔嵬。四化红心，
鼓舞惊雷。缅怀前哲，崛起群才。遥情深邃，
梦寐低回。尔乃跨雁江之浩瀚，联胜迹之异彩。
历沧桑之变革，比新旧于文海。冥搜文献之芳馨，
庶垂典型于百代。倡科技以兴邦，开放改革永不怠。
桑梓感情既根深，爱国精神喜常在。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序

中共资阳市委书记 曹荣火

县志采编王洪林同志把他多年辛劳缀集的《资阳史话》摆在案头，抽空细读，悠然神往于书中所述的遥远而又切近的故事，这对我们认识资阳的昨天和建设新的资阳，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值得向同志们推荐。

八年前县志工作草创之时，有人就力举小王同志，说他求实喜真，热心修志，20岁即已掌握几多鲜为人知的地方史料，是修志工作的适合人选。我听了很高兴，欣然允准其请。1986年小王调入县志办公室，七年来为编修县志出力不少，未负众望。尤为可贵的是，他把业余精力也几乎全部投入地方史迹探索，这对于廓清资阳古史迷雾自有进益。小王是个务实的小伙子，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青年。在认识家乡、建设家乡方面，直接投身经济建设固然是振兴资阳，而从事文史研究，使后学能准确把握家乡的历史和现状，也同样是有利乡邦长远发展的举措，这是符合党中央提出的两个文明建设并重宗旨的。这里，不妨重述一下1991年8月我在资阳文献整理出版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致词：希望全市文化人“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扬己之长，积极努力，早日出齐《资阳文献丛书》，为增进对家乡的了解，进而更好地建设家乡做出贡献”。

一切既成过往，而流不走、冲不淡、抹不掉的都是历史。或久经冲刷而流布四方，或深藏于地下，或蒙尘不显，长期弃置，这些都是需要慧心人寻觅搜求方才焕发异彩的。资阳而今正在形成这样的文化群，我想借用四川省志编委副主任魏国桢同志1987年1月回县检查修志工作时对小王的赠言作结：

要团结一批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带动一批，就是你们这一代，为二十一世纪修志打下坚实基础。

资市通史朗编在，阳春何处不飞花！

1993年2月26日于市委办公楼

与王生洪林谈修志(代序)

张圣獒

地方志有比较重要的几点。第一点，地方志是国家历史的基础，国史主要总揽全国历史发展在某时代的全部过程，对地方不可能很详，地方志可详史之略。据章实斋的意见，方志体例不可能一律，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制度民俗及其资料而制宜。如四川地方志中，资阳的石刻可详，可同大足、安岳互相比较。地方志与国史有关的部分，国史有了，地方志应详，国史如有误，地方志应加适当纠正，发挥民主的精神。现在的地方志，把历史上的东西必须搞清楚，但不能抹杀历史的主流及其文化文物的重点所在。例如资阳三贤祠，现在没有了，所以县志应详载。地方的名胜古迹不能完全拿现在做标准，能追叙则追叙，征集照片、图画。三贤祠我建议恢复，尽可能另建恢复。第二点，新方志记改革的具体事件及其成果应详。弃农经商这是一个问题。改革以来农村的具体情况。农民致富是对的，但是否都达到目的，值得研究。农业减产，农村生育人口（这里指黑人口，未呈报所多生的人口数字）暗暗增加，值得忧虑。关于农业经济方面，我希望县志能够注意这些及其他有关的问题。

关于文化方面。资阳还有没有文盲？这是普及教育方面的

问题。至于提高文化方面，县内前辈的遗书，艺文志古今均载，要精选，滥竽充数没有必要。家谱很重要，要注意搜集。解放后第二年去资阳考察，见一块匾写着“太子少保”某某，能搜集到这些历史的本证旁证可尽量搜集。从来家庭组成社会，每个人都有姓。例如王家的家谱就是王家活动的历史记录，要重视。

王褒我很佩服，12岁读《僮约》，我就很想念这个人了。《王諫议集》望能见到。你现在还很年轻，明年才24岁，继续这样搜集下去还了得呀，你的前途是希望无尽的！我从小就喜欢王褒，但总觉得他的东西保存下来的太少，只从《文选》和张皋文的《七十家赋》上读到几篇。皋文张惠言，清大学者，搞《易经虞氏学》，为三国东吴虞翻易学的专家，与惠栋所著《汉易述》及焦循所著《易章句》《易变通》，明来知德著《来瞿唐易经》之谓易学通家者有异。你要我为你的《王褒集考译》作序，可以可以！王褒一定很幽默，文章写得很活泼，他的东西好是好，可惜太少了。

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宋元之际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以后《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为续三通，加上《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计九通，再加清末浙江刘锦藻《续清朝文献通考》，共十通，商务印书馆出版，要购置。历史与文学。历史不欢迎假定，写历史的文学，写作手段可以很高明，但史实不能假定，必须占有资料，从多方面求得实证，故史学是记载时间活动证实的综合学科。一个史学家要虚心，这是牵涉史德的问题。要谦虚谨慎，不能解决的问题宁可付之阙如，留下空白让后人填补。所谓多闻缺疑，避免主观武断，尊重客观史实。考异可以把诸说排列出来，不一定都要肯定。注意史源学，考证属史源学的范

围，是史学的材料，区别互相转抄的东西，不要误流为源。历史不要包办，考证也不要包办，拿出证据，让大家来谈。全面占有材料是对的，但是不可能。这里有三难：不蔽于古，即不被古人所蒙蔽；不蔽于今，即不被今人所蒙蔽；不蔽于己，即不被自己的主观成见所蒙蔽，非渊博不行啊。

要爱惜时间，不要搞普通应酬，搞多了占去时间，没法做学问了。中国人把时间看得不值钱，这是一个民族的弱点。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也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要讲时间利用效果，处理事情要抓住根本。

顾亭林会治生，云游天下，随带书籍，随时随地访问，其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兼采方志而成。黄梨洲、王船山爱住学生家。黄梨洲著《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王船山著《永历实录》和《莲峰志》。史学从实践到理论需要深厚博大的基础，搞方志比较简单，只要有人力博访周咨地方史料就可以做出许多成绩。但方志不同于国史之处，不仅在史料范围的广狭，尤在方志必须突出表现地方特色。顾亭林说，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之人坐食终日言不及义。唯吾生谨记之，勤思之，力戒之。

1987年12月26日于成都

目 录

资阳文献丛书总序	张圣樊 (1)
序	曹荣火 (1)
与王生洪林谈修志 (代序)	张圣樊 (3)
籍贯的考订	(1)
资阳人究竟出于何地	(4)
李公度	(6)
张圣樊教授与资阳人化石	(10)
读《汪氏宗谱》忆剑魂先生	(13)
为修方志谒二老	(16)
资阳三贤	(20)
资阳洪旱石刻述略	(30)
雁·阳县·王二溪	(34)
李白访范状元及其《送友人》诗辨	(36)
巴蜀状元五疑	(38)
《华阳国志》图纬键柯辩	(40)
陈子昂辞土主神	(42)
章园忆王树楠	(45)
王褒二题	(48)
萇弘问难	(50)
吴道子三次入蜀	(56)
资国郡县新证	(61)

隋唐五代龙水城址考	(67)
范祖禹所咏东津寺在哪里	(70)
毛主席酣春过资阳	(71)
李公度点批《左传》韬略见一斑	(73)
裴弘禹州蜀邑考	(75)
智诜宗派传法探介	(79)
资阳酒史话	(86)
吴道子冥灵还乡记	(89)
方仙道祖裴弘轶事	(91)
王褒和汉晋道释的关系	(95)
《风赋》为王褒作辩	(99)
资阳五台	(104)
资阳瓦窑湾元明石刻析	(111)
雁江溯源	(112)
资阳人博物馆三设想	(114)
唐代高僧智诜禅师的情况调查	(118)
在资阳文献整理出版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121)
丹山寺塔记	(123)
花蕊夫人故实	(125)
理家谱忆子南	(129)
资阳龙潭沟张方题刻释义	(131)
资阳出土南宋诉讼碑	(133)
资阳人口发展史	(134)
后记	(182)

籍贯的考订

人们对古文化的发掘整理，涉及古人的出生地，曾引起不少争端。杨升庵说过：“磬石一赵逵也，内江之士曰吾赵庄叔也，资县之士曰吾赵状元也，资阳之士曰吾赵栖云也，三邑皆尸而祝之。”这种争端，始于古而续于今，特别是修志工作方兴未艾的现在。

资阳古来号称三贤故里。王褒在西汉光照文苑，董钧在东汉辉映儒林。南宋杨朴1149年写过《重建二贤堂记》，那祠堂祭祀王褒、董钧。他们的出生地在城北20里处隔江相望，所以并立一堂。至于三贤，则始于1774年。以前在天台山有赞圣祠祀萇弘。战国以来，关于萇弘的传说很多，大抵说他是蜀人，生于资邑，先秦史料缺乏，就是《史记》也简略，直到《资阳图经》才落实他为蜀资中人。当时的资中就是今天的资阳，今天的资中北朝时才开始建县，1913年易称资中县。《汉书》记述王褒为蜀人，那时资中县已经建立数百年了，还这么写，未免太粗略了，王褒在前59年所作的《僮约》一文中就明自称资中男子了嘛！常璩《华阳国志》始记王褒为资中人，《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记述他是资阳人。《后汉书》记董钧为资中人，也是因为当时还是这么个称谓。后来，又另行据实重书了。唐宋《资阳图经》也记载三贤出生在资阳。为什么又改变了说法了呢？因为那时古资中的含义早就发生了变化，辖区早已缩小，以至于取消了。洪雅眉山争田表圣，安岳乐至争

陈希夷，绵阳潼川争苏易简，也是同样的起因。这类因住地迁徙、籍贯误记、地名变动或因疏忽、记载不详而引起的争端，在历史上较为普遍，时至倡导实事求是的今日，仍旧屡见不鲜，这就值得引起我们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注意了。

对古人籍贯的确定依据是什么呢？全面地、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把握好时空观念。

就时间而言，中国历史纪元相当繁复，纵贯五千年，横列几个甚至十几个政权，周朝更有百二十国，都各纪其年，有的年号改动频繁，有的年号废了又用。有时一个皇帝早死了、或者一个朝代消灭了，年号还在用，这是遗老逸民的寄托。有的年号随意简称，又不写明皇帝和朝代，一旦碰上同名年号，就更费解了。各种复杂情况的纵横交错，这就要求我们在印证和互换的时候必须特别审慎，实事求是地加以考证。

就空间而言，在地理位置上，山川的变迁相对说来总是比较小的，不象年号那样。可是中国之大，州县之多，废置之频繁，名称之多样，是非常突出的。月亮盈亏消长有规律，州县的“阴晴圆缺”却不一定。不过治所的迁移，总是逐渐趋于合理的，以交通方便，位置适中，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有这么一种情况，明明当时某地已经改用新名了，文人学士故弄风雅，追求古意，在行文时偏爱使用多种早已废止的名称，而且往往又不加注释，使人如堕五里雾中；还有一种人为的称谓混乱不清的状况，这便是历史资料对各地建置沿革记述的缺漏错讹。尤其是权威书籍的纰漏，年代一久，资料散失，后人又凭什么去考订呢？占有了原始的资料固然好，也需要加以辨析。中国封建社会割据势力严重，有些不显眼的小州县，早已陷入割据者手中，正史为了表示收复失地的深义，也予以载录。久而久之，这个地点的废置虚实就难以弄清了。

因此，我们就应该把视野扩大，细心审视，以洞察千百年历史的毫末，冰释疑团。

把各该历史人物诞生地的政区建置一一找出，明辨清楚之后，就可以在现存的各种不一致的说法里面，参之时间，考以范围，在时空坐标轴上来找准一个点。比如南宋宰相赵雄，《宋史》只载资州人，考其具体地点，得知在今资阳丹山区境内，因丹山曾为磐石县辖地。明朝资县人士仅以磐石为据，这就不对了。《四川古代名人》定赵雄为资阳人，是费了心力的。不加分析地仅以墓地定桑梓，也不见得就对。人们出于怀念，可以在各地为名人修很多衣冠冢，有的系疑冢，有的属客死他乡未归葬故里，怎能见墓就招故乡魂？资中的王褒墓，资阳的赵逵墓，都是伪托。这里还有一个习惯问题，过去一般遵从祖籍，而今均以本人出生地来定籍贯。明朝户部尚书周洪谟，祖先宋代住在资阳，而他却是长宁人，清《资阳县志》还将他收入，这是滥收。只有剔除烂叶，扬弃飞花，摘掉枯枝，才能使历史地点连同当时活跃在这里的人物，发生在这里的事件再现于眼前，象培植树苗一样，铲尽旁逸的虬枝，显示本来的面目，让桑梓的根一一扎入属于它们自己的一片片土壤中去，这便是园丁高手的功劳了。

1986年8月19日

资阳人究竟出于何地

黄鳝溪何其有幸，几乎举世闻名？说起它的发迹史，还得详考当年的讹传。

1951年，在城西半公里的九曲河铁路一号桥墩旁发现了人类头骨化石，在场工人告诉考古工作者说这里就是黄鳝溪。自《资阳人》专著问世，“黄鳝溪发现资阳人”这一消息也就传播中外，几成定论，黄鳝溪便取九曲河而代之。

几万年来，埋葬新人化石的土壤究竟在什么河畔，让我们来看一看黄鳝溪和九曲河各自的来龙去脉就明白了。

九曲河原名资溪，这在《太平寰宇记》中可以印证。它源出简阳芦葭桥，流长52公里，流域面积368平方公里。资阳城南1.5公里许，有东南折向西北的天台山，城北有东岳山^①。九曲河由西北流入这两座山之间，冲积形成一个小平坝，河流在这里更为迂回，辗转到城东南3里远处注入了沱江。清乾隆年间，知县杨周冕将资溪改名为九曲河，因资溪至此，澜回九曲，如蟠龙戏水。1959年，为引水发电，填河造地，九曲河已被裁弯取直。

黄鳝溪是从南市乡崔家沟发源的，源头海拔447米，流经书台山麓，在海拔343米的黄鳝溪口注入沱江，全长5公里，

①裴文中《资阳人》开卷篇中有“北有东西方向的北岳山”之说，显系作者不知此山因东岳庙得名，以为山处城北，而误为北岳山。

流域面积4.6平方公里。因下游是懒伸懒伸的，像一条黄鳝平躺在那里，故名。民间传说，从前一小孩失足落水，掉在黄鳝背上，十分惊恐。那黄鳝说，你饿了就挖我背上的肉吃，谁知吃一口黄鳝就大一点，终于大得露出水面，小孩得救了，黄鳝游入沱江。1958年至1962年，人们在书台山改梯土，黄鳝溪的上游被土方填平，下游也多半淤塞，只存干涸的河床，间或有个水凼。

无论是沱江、九曲河还是黄鳝溪，在县城附近都有较大的改道。有自然形成的，有人为造成的。清《资阳县志》说，资溪“流近县西，一路委曲，至县南名黄鳝溪”^①。因此，资阳人的出土地应在九曲河畔，而在黄鳝溪。

1986年12月16日

①1974年，刘兴诗著文《考古学报》纠正道：“九曲河为全河的通称，黄鳝溪仅指其河口附近一小段，并不包括化石产地所在处。又，越过南市街三级阶地，另一小河亦有称黄鳝溪者。如按黄鳝溪之名称，在当地每易找错位置。”可惜长期未被注意。

李公度

李公度名大钧，1877年3月22日生于资阳县大佛寺场边，祖籍陇西，徙湖北麻城孝感乡，明代入川。父李仕海字魁麟，母孙氏生于仁寿县之望族。李公度弟兄九人，他居第四，幼年家境十分清寒，靠长兄李明安租种庙产支撑门庭。他自幼多思善辩好翻案，尤喜深究前四史。1902年考中举人，1904年春赴京应试，因试卷遗失，点翰未成，获公费游学日本法政大学经纬学堂，研习明治维新，勤奋攻读，为同窗所敬重。房东爱才不嫌贫，执意将女儿真奈惠子许配给他，易名李兰卿，1908年毕业后偕同回国，生二子一女。李公度晓畅国文，精通日语，清政府总署派他驻奉天四平街，任公主岭外交司参事。他与日本人办交涉，每遇不平，皆据理力争，不为淫威所屈，日本人因此敬畏。其妻教子说日语，他坚决反对，并且不准孩子要太阳旗。1909年调新民府交涉司，后复任公主岭外交司参事职。1910年夏，中俄更订条约，李公度作为协办陪同沙俄大使到北京，8月8日订立《松花江行船章程》。事毕调任辽阳知州。时霍乱为患，因参与救治有功，受金质奖。在奉天，有不少革命党人是他的同窗好友，他设法办理外交护照，保护他们安全活动。

1913年，李公度就任热河省政务厅长，摄理民政长，7月31日熊希龄调任国务总理后，他代理热河省都统。当时，日本觊觎我东北，沙俄窃割蒙疆，英国蚕食西藏，法国窥盗滇桂，

国势危如累卵。他认为要巩固国防，必须团结蒙藏各族，而蒙藏政教合一，不懂佛学很难交心，于是深研佛理。1914年到北京出任国务院秘书，继任法制局参事。在这里结识了班禅、诺那，为国论交。1917年夏秋之际京津附近水灾严重，他调任华北五省水灾处长，与熊希龄一起办理河工事宜，做了大量救济灾民、扶助生产的工作。1918年救灾任务完成后，北洋政府奖给他二等大绶嘉禾章。

1921年乡友杨芳毓推荐李公度，并刘湘三次电邀他回川襄助。李公度于秋后脱身回川，在川康善后督办公署任秘书长。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湘在重庆新设省长政务处，聘李公度为处长。刘湘第二军防区的县长和征收局长，都归他委派。他善谋远利，劝刘湘办法院，从政治入手解决社会问题。并率先努力，一天能批阅百卷公文，对各县政法界的上诉案件，他可以直接交谈，不翻底卷，一一道来，与先前批发的意见毫无二致，令人折服。1925年2月18日，他在给李来宾的信中表白心迹说：

“惟于民生疾苦尚不敢忘，庶几可副师教于万一。”后来重庆市政府拆民房修马路，一平方丈赔十块大洋，李公度不批，屡经催办，审定为三十块。他还鼓励女儿钻研医学，为民众解除疾苦。1926年12月17日刘湘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委李公度为军部政务处长，总理二十一军的民政大权，是刘湘的得力助手，有其军师之称。师长多执弟子名刺拜他为老师，有的师长要保荐县长，李公度说：“你保这人字都认不倒两个，还想当县长？！”他不顾一些人的不满，坚持量才录用，拒收财礼，秉公执政，赢得不少人的尊敬，名列重庆五老之首，是商界、学界、军政界的知名人士。他还在三牌坊与人合开电料行，有不少股金收入。冬天，他迎诺那呼图克图来渝设坛授经传教，又赞助太虚法师在北碚缙云山建汉藏教理院。四年后聘

西藏大喇嘛多杰格西由北京来渝主持和平祈祷大会。1927年春夏资阳大旱，捐赠五千大洋，赈济家乡灾民。

李公度身居军政，心怀学界，以千百倍之赤忱，矢志办学。他与朱叔痴、汪云松相亲厚，经常往来。1928年暑期，一批川东籍教授到余家巷为办学专访李公度。李公度深思熟虑，认为四川多难，百年树人实在是当务之急。次年6月他任军部政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以二十一军向商会预征的五十万元税款，作为办学经费。征得刘湘同意，7月里，在商会大礼堂筹商成立重庆大学，被推举为副校长，8月4日又推选为筹委常委，分任总务股事务主任。9月14日，他在军部书报室召开第一次校务会议，讨论成立招生考试委员会，并任监考委员，随即进行招生考试。

1928年10月14日，刘湘派王陵基公审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等二十余人，张秀熟大义凛然，痛斥军阀。中共地下党动员各界营救，李公度得知，力劝刘湘把案子从卫戍司令部移交地方法院。时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布《处置异党条例》，政治犯一律由法院审判。刘湘迫于内外压力，只好交法院。法院判刑后，李公度去巴县监狱与张秀熟恳谈，知其学识渊博，胆略过人，精通古籍，尤擅《诗经》，深爱其才。

1929年10月12日，重庆大学在菜园坝杨家花园开办，校长刘湘很少到校，由李公度代行校长职务。为了使学生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李公度一行乘汽艇上溯长江、嘉陵江踏勘，选在沙坪坝建立校址。1930年初，他多次召开校务会议和筹委会议，讨论校址、立案、经费等问题。3年后重大迁往沙坪坝，学校每月付给二百元舆马费，他分文不收。

李公度热心教育事业，他很注意成年妇女的职业教育。当时女子学校不收已婚妇女，而由他创办的重庆女子职业学校